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四十一期
2025 年 10 月，頁 1-38
國立臺灣文學館

意外的先驅*

——冷戰時期的文學調查、讀本政治與華語教學

陳柏旭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摘要

文學調查素來被認為是普通讀者文學品味之中立反應，因而甚少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然而，文學調查的動機、前置作業與後續，從設計問題、擇定調查對象、抽樣、到編輯讀本等一系列過程，無一不深受時代背景、政治立場、意識形態所驅動。本文分析美籍研究生聶維斌（Neal E. Robbins）於 1970 年代末在台灣留學、工讀期間自發進行的文學調查。其留存的文件保留了從調查、與出版社洽談、編輯成書等一系列完整的過程。本文藉此探討文學調查與外譯、「典律的生成」以及華語教學之間的關係。

聶維斌的文學調查正好發生在 1970 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後以及台美斷交（1978）之前的冷戰罅隙。美、中、台關係之巨變不僅反映在外交關係上，美國的東亞系課堂上對華語文學的受容也為此經歷劇烈的調整。此際，台灣文學尚未大規模進入英語學界研究以及大學課堂。以此，聶維斌的文學調查成為台灣文學研究在英文學界尚未建制化時的「意外的先驅」。前行研究多將文學的翻譯放置在世界文學、翻譯理論等較為高蹈的研究次領域探索，但忽略了文學翻譯所肩負的另一項重要基礎功能——語言教學。聶維斌的文學調查與編輯顯示，在冷

* 本文資料之取得仰賴聶維斌（Neal E. Robbins）、蘇文瑜（Susan Daruvala）慷慨提供。相關資料曾於 2023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4 年 9 月 15 日間以「在 1970 年代建構文學讀本：一個美國人／兩種意識形態」為題展出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筆者感謝審查委員的意見。林書嫩、朱家立、楊中薇、蔡曉林、鍾秩維、張詩勤、楊富閔、謝伊柔、陳定良、許明德等多位學友曾閱讀本文初稿並惠予高見，在此一併謹致謝忱，然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戰「兩個中國」的折衝之下 ，文學讀本亦是在西方爭奪的場域之一，值得學界進一步探索。

關鍵詞：文學調查、文學讀本、文化外交、外譯、冷戰、鄉土文學

Accidental Pioneer:

Literary Surveys, the Politics of Readers, and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during the Cold War

Chen Po-Hsi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Literary surveys have often been regarded as neutral reflections of the general reader's aesthetic preferences, and thus have rarely entered the purview of literary studies. However, the motivations, procedures, and outcomes of such surveys—from the design of questionnaires and selection of participants to sampling and anthology editing—are deeply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ir tim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iterary survey conducted by American graduate student Neal E. Robbins in Taiwan in the late 1970s. The surviving documents preserve a complete record of his activities, from questionnaire design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publishers to the compilation of a literary reader. Using this survey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ersections among literary surveys, translation, canon formation, and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Robbins's survey took place in the interstice between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6) and the severance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1978). During this period, drastic shifts in Sino-American–Taiwanese relations were reflected not only in diplomacy but also in how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was received and taught in the East Asian studies classroom setting in the U.S. At that time, Taiwan literature had yet to gain institutional recognition in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as such, Robbins's survey became an accidental

pioneer of Taiwan literature's introduction to the Anglophone world. While previous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discusse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world literature or translation theory, it has overlooked another foundational function of translation—the teaching of language itself. Robbins's literary survey and editorial practice demonstrate that, amid the Cold War contest between the "two Chinas," literary readers also constituted a site of cultural negotiation.

Keywords: Literary Survey, Literature Reader, Cultural Diplomacy, Translation, Cold War, Nativist Literature

一、前言

文學調查素來被認為是普通讀者（general reader）文學品味之中立反應，雖然行之有年，但甚少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然而，文學調查的動機、前置作業與後續，從設定問題、擇定調查對象、抽樣、分析結果、排名，到編輯讀本等一系列過程，無一不深受時代背景、政治立場、意識形態所驅動。在跨語際的脈絡中，文學調查甚至會涉及譯介、語言教學等問題。選擇何種文學文本作為華語教學素材，亦反映了華語教學現場的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若是將文學調查抽離了其大時代政治意識型態背景，則難免有所匱缺。

一般想到文學調查，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文學刊物附頁的回函，以及據以輯成的年度小說選。然而，本文所要探討的一起特殊的個案，並非系統性的實踐，而是美籍研究生聶維斌（Neal E. Robbins）於 1970 年代末在台灣留學、工讀期間自發性進行的文學調查。聶維斌於 1954 年出生於美國芝加哥的一個猶太家庭，祖父母是從當時的俄羅斯（今屬烏克蘭）領土移民至美國，母親的家人則於 19 世紀中先後從歐洲各地移民到美國。1972 年至 1976 年間，聶維斌於聖路易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t St. Louis）的中文與亞洲區域研究學系就讀學士班。換言之，聶維斌在大學的期間正好是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華後、中美關係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時，同時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前的最後幾年，美國學生對以第三世界國家龍頭自居的中國，都深深感到好奇。

然而，由於彼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對美國學生開放，台灣因此就成為瞭解中國最合理的切入點。1978 年，聶維斌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就讀碩士班期間，有感於此前在美國學習華語時難以接觸到台灣文學作品，因此在未有體制授意、亦無資金挹注的情況下，自行進行問卷調查。[1]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他不僅撰寫研討會論文發表初步觀察，更重要的是與耶魯大學出版社（Yale University Press）旗下的遠東出版（Far Eastern Publications）編輯接洽，取得原作者授權後，出版了《現代中文小說讀本》（*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一書，意欲

1 有關聶維斌的完整生平，見陳柏旭，〈1986 年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出版緣起：聶維斌的臺灣文學調查〉，《閱．文學》79 期（2023.06），頁 74-80。

作為美國大學課堂內的華語教材。[2] 後續，聶維斌於 1978 至 1979 年返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新聞學院就讀，畢業後至 1985 年間輾轉於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的各地單位之間：在香港辦事處實習直至 1983 年，1983 至 1984 年間調赴印度新德里之辦事處任通訊記者，再於 1985 年轉往華府。1986 年左右離開合眾國際社在芝加哥羅斯福大學（Roosevelt）教授新聞學。1990 年，聶維斌受到母校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喻德基延攬，於 1991 至 1993 年間再度前往台灣，在喻氏創辦的臺灣大學新聞學院任教。2022 年起，聶維斌進入倫敦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攻讀台灣研究碩士學位，期間拍攝紀錄片 *Taiwan Undaunted*，持續 1970 年代以來對台灣的關注。[3]

聶維斌並非當今意義下的台灣文學專業研究者，卻以業餘研究生之姿，不經意地成為在海外推廣台灣文學的意外的先驅——儘管仍是在「兩個中國」的脈絡下被錨定為「自由中國」的台灣文學。從抽樣、統計、與出版社魚雁往返、以迄最終出版，聶維斌的文學調查提供了一系列難能可貴的過程。藉由分析此一案例，本文探討文學調查、典律的生成、外譯以及華語教學之間的關係。首先，聶維斌的文學調查正好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後以及台美斷交（1978）之前的冷戰罅隙。美、中、台關係之巨變不僅反映在外交關係上，美國的東亞系課堂上對華語文學的受容也為此經歷劇烈的調整。此際，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學術圈，顯然都開始注意到將台灣文學代表作品翻譯為英語之必要。中華民國筆會於 1972 年開始編譯英文季刊定期選譯台灣文學作品。齊邦媛於 1975 年為國立編譯館編選《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臺灣 1949-1974》（*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英譯。[4] 隨後，劉紹銘於 1976 年編輯出版《來

2 Neal Robbins,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our Short Stories,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 for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Yale University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1986.《現代中文小說讀本》為出版社下的中文標題。

3 陳柏旭，〈1986 年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出版緣起：聶維斌的臺灣文學調查〉，《閱．文學》79 期，頁 78-80。

4 Pang-yuan Chi, et. al., editor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75. 齊邦媛推薦小說作品包括孟瑤〈向日〉、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襉裙〉、潘人木〈夜光杯〉、彭歌〈蛙人記〉、王鼎鈞〈哭屋〉、段彩華〈女人〉、白先勇〈花橋榮記〉、

自臺灣的中文故事：1960-1970》（*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一書。[5] 顯然，在齊、劉編出台灣文學英譯選輯之際，時值大學生涯尾聲的聶維斌尚無緣得見。並且，齊、劉版的選輯是直接將文本譯為英文，而聶維斌所屬意的格式（也是他最終的編選方式）則是中文文本輔以生冷僻字中英對照，供語言教學現場之用。

前行研究多將文學的譯介放置在世界文學、翻譯理論等較為高蹈的理論領域探索，但往往忽略了文學翻譯所肩負的另一項重要基礎功能——語言教學。聶維斌的文學調查與編輯顯示，在冷戰「兩個中國」的折衝之下，文學讀本亦成為在西方爭奪的場域之一。本文認為，聶維斌的文學調查個案，適足以為幾乎發生於同時的鄉土文學論戰之補充。就方法論而言，若說同期的鄉土文學論戰在文學雜誌、報刊等公開平台提供了諸多的文學評議，那麼，這一批新出土的問卷回函，則提供了作家、論者在同一時期的一股伏流。這批文獻對文學社會學、冷戰下的文化交流、以及文學讀本如何建構文學觀，均有所著墨，或能為近年台灣文學的外譯計畫有所啟發。

二、公共意見調查的方法論

如前文所述，年度文選的編輯——文本典律化的重要過程——若非透過專家評審意見，則是透過讀者意見調查來進行。換言之，意見調查乃是將特定文本典律化相當常見的前置作業，但此一重要的步驟目前為止並未進入台灣文學史研究方法的視野。[6] 文學理論中曾經較為風行的「讀者反應理論」（reader response

王文興〈黑衣〉。見齊邦媛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與其主編之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 多所重疊。

5 Joseph S. M. Lau, editor.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劉紹銘書中收錄的作品包括陳若曦〈最後夜戲〉、王文興〈欠缺〉、陳映真〈第一件差事〉、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王禎和〈嫁妝一牛車〉、於梨華〈柳家莊上〉、張系國〈地〉、黃春明〈看海的日子〉、林懷民〈蟬〉、楊青矗〈冤家〉、白先勇〈冬夜〉。推薦給聶維斌的作品則是陳若曦〈尹縣長〉、陳映真〈唐倩的喜劇〉、白先勇〈遊園驚夢〉、劉大任〈落日照大旗〉、張系國〈紅孩兒〉、黃春明〈兩個油漆匠〉、王拓〈獎金2000元〉、奚淞〈吳李錦鳳的禮拜天〉、小野〈封殺〉、王禎和〈小林來台北〉。見劉紹銘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6 在學術資料庫搜尋「文學調查」之結果，較多是關於採集民間文學之研究，而非本篇所討論的通過問卷回函等方式測量讀者喜好的方法論。例見江寶釵，〈走過的痕跡——嘉義地區文學的採集、調查、整理與研究概述〉，《漢學研究通訊》19 卷 2 期（2000.05），頁 188-195；陳益源、林愛娥，〈康原作品與民間文學〉，《民間文學年刊》1 期（2007.07），頁 145-157。

theory），如 Stanley Fish 的「詮釋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Hans Robert Jauss 的「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等概念，也較強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可以積極參與詮釋文本的部分，而非探討外部的標準、量化如何檢測讀者意向。

歷來與「調查」（survey）相關的前行研究中，有關文學調查（literary survey）的相關研究雖少，但有關「社會調查」（social survey）的研究則汗牛充棟。後者的相關研究多半著重在社會事實（social facts）與社會治理的關係。例如林東（Tong Lam）認為，社會調查不僅是搜集資料的工具，更是晚清中國知識分子政府試圖將被調查的對象轉化為現代國家的集體人民，並藉以發展現代的治理技藝。[7] 有論者批評林東將清末以降的社會調查活動浪漫化為一種由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專業團隊執行的過程，彷彿調查能夠順暢無阻地獲取精確的社會事實。[8] 然而，本文的研究旨趣恰恰在於這種不符合現代社會科學規範的非專業調查活動。透過解讀這些不嚴謹、隨機性強、帶有自發色彩的調查實踐，或許正能挖掘出更為豐富的文化意義和歷史脈絡，揭示看似不完美的調查如何反映了社會轉型期的讀者經驗。

在方法論上，對本研究頗有啟迪的是有關「蓋洛普」（Gallup）民調與好萊塢電影工業關係的研究。蓋洛普民調得名於 George Gallup 精準預測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將於 1936 年的總統選舉獲選連任，因而聲名大噪，隨後其抽樣方法被廣泛地運用。民調使得意見可以以數字量化，變成容易計算進而管理的對象，為施行秩序提供的方法，此即蓋洛普民調之於大蕭條時代美國的意義。好萊塢迅速從中習得將統計數字兌換為商業利益的潛力。Susan Ohmer 在《喬治．蓋洛普在好萊塢》（*George Gallup in Hollywood*）一書中，先是區隔了電影「觀者」（spectators）與「觀眾」（audiences），前者是精神分析的對象，後者則是社會學的分析對象。雖然在以精神分析掛帥的電影研究法中，「觀者」

7 見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8 江勇振，〈評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 期（2013.03），頁 173-199。

的心理活動（例如窺淫慾〔voyeurism〕）是重點分析對象，然而對於電影產業而言，是消費購票、上電影院等具體外在「行動」才定義了「觀眾」。[9] 也許我們也可以將此一區分套用在文學的接受上，將文學讀者區分為心理學意義上的讀者與社會學意義上的讀者。若是文學理論研究中的精神分析強調閱讀當中的讀者體驗，那麼文學社會學中則應著重分析消費、購書等外在的文學閱讀行為。

歐美大眾閱讀史的相關研究中，除了作者自行發問卷以進行研究之外，也不乏從機關檔案中挖掘出歷史上各個教育相關機構曾經進行過的問卷調查，據以考察普通讀者的閱讀習慣、偏好等。Janice Radway 在對美國浪漫小說讀者的研究中運用問卷調查的方式，歸結出女性讀者由於為母職所累，因而遁入浪漫小說的世界，藉由認同於女主人公的方式獲得心靈上的滋養。[10] Jonathan Rose 在探討英國工人階級的名作中，徵引了 19 至 20 世紀的問卷調查，從中注意到相較於維多利亞時期工人對自身階級歷史以及莎士比亞的戲劇求知若渴，然而到了 20 世紀初，相關的求索熱情已急遽下滑。[11]

總的來說，這些研究運用調查作為一種系統化的方法，透過標準化問題向特定人群收集量化（數字化的反應和行為數據）與質化（開放式回答的意見和原因）資料。這些數據被用於量化和理解公眾的意見、偏好、行為模式以及這些模式與人口特徵、社會背景等因素之間的關係。同時，資料也指出，儘管民意調查追求科學方法，但調查結果的解釋和受訪者對問題的理解都可能帶有主觀性。最重要的是，從上述英美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民調能反應特定性別、階級群體的閱讀習性與時代變動之間的關聯。

三、「兩個中國」下的文學調查

（一）春江水暖鴨先知：鄉土文學論戰的側面

儘管聶維斌的文學調查純粹只是個人發起的自主行為，並沒有類似美國新聞

---

9 Susan Ohmer, *George Gallup in Hollywoo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

10 Janice Radway,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11 Jonathan Rose,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93.

處等文化冷戰性質的機構奧援，但正是這種非官方性質，使其成為考察 1970 年代民間層面文化政治的獨特切入點，揭示了即便在非公開的領域，文學作品的編選仍然關乎文學認同與文化代表權爭奪的大議題，且在民間存在。從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1）至與美國正式斷交（1979）之間，美、中、台關係的巨變不僅只發生在政治、外交領域，文學也成為兩個中國在美國競逐的場域之一。聶維斌的大學生涯（1972-1976）正好經歷了尼克森訪華後中美關係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之際，同時亦與文化大革命（1966-1976）結束前的最後幾年重疊。此時的美國大學校園，對中國的認識正經歷著巨大轉變。在全球毛主義（global Maoism）的思潮影響之下，此前受到反越戰運動洗禮的美國學生，有許多對以第三世界國家龍頭自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持濃厚興趣甚至崇敬之情。

不過，從他的問卷內容與後續的詮釋來看，聶維斌並不屬於在全球毛主義當中傾向社會主義中國的一派美國學生，而較為偏向反共／自由中國。2023 年，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為聶維斌的藏品舉辦「在 1970 年代建構文學讀本：一個美國人／兩種意識形態」展覽，根據與聶維斌的通訊紀錄編輯的展覽手冊指出：

> 儘管當時聶氏因美國學生身分而被中國大陸阻絕於外，然而有感於中國文化大革命如何摧殘傳統的悲劇，且社會主義文學實難以引起他的興趣，故深思如何奠基於中國傳統文化並兼容臺灣文學發展的文學史觀，來重新審視並建構中國當代文學讀本的重要性。[12]

由於在學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對美國公民開放，因此，對於想進一步瞭解「中國」的美國學生而言，台灣就成了最為可行的替代方案。聶維斌也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於 1976 年前往台灣，並於翌年進入國立臺灣大學攻讀中國文學碩士學位，但也立即意識到中文學習的困難，因此並未完成學業。也正是在台灣求學、工讀的日子，使得聶維斌認識到有許多此前「身為大學生時未被介紹的作家」，

12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在 1970 年代建構文學讀本：一個美國人／兩種意識形態」展覽手冊（展覽地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1 樓大廳，展期：2023.12.25-2024.09.15）。

並開始對當時在台灣文學界熱議的鄉土文學感到興趣。[13] 這也促成他日後起心動念編輯台灣文學讀本之動力。

不過，從這段期間留存的剪報資料來看，聶維斌搜集了顏元叔教授在《時報週刊》上所發表「我國當前的社會寫實主義小說」系列評論，並至少試圖閱讀了該系列的〈總論〉、〈評陳若曦〉、〈評王文興的作品〉、〈評陳映真的作品〉、〈評王禎和的作品〉、〈評黃春明、張系國的作品〉、〈評楊青矗、王拓的作品〉等幾篇，並寫上注音符號與中英單字對照。[14] 根據王智明對顏元叔同期的文學評論研究，雖然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自由人文主義（liberal humanism）在西方配合冷戰固化了性別、種族秩序，但在顏元叔的批評實踐當中，「不只維護了鄉土文學的寫實與批判取向，更將原有菁英色彩的自由派人文主義文學關懷轉化為人本主義的養分，務求文學的討論回歸人的核心關懷，讓社會寫實主義的主張成為開放社會、追求民主的動力。」[15] 雖然，聶維斌是將顏元叔的報章文章當作學習華語的素材，難以判斷他從中是否具體吸收了顏氏的思想，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透過顏元叔的系列文章，聶維斌關注到了寫實主義小說以及評論界的動態。又或許他至少從顏元叔的批評文章中，得知了幾位作家的名字——畢竟，顏元叔所評論的陳若曦、王文興、陳映真、張系國的作品，後來都收錄在聶維斌自己編註的《現代中文小說讀本》；王禎和、黃春明也榜上有名。

這份問卷的開頭，已經開宗明義地將收錄的對象限定在 1949 年以後「自由中國」的文學作品：

> 我是在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念書的美國學生。我覺得西方讀「中國文學和中文」的學生雖然接觸過五四運動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國文學，但大半忽略了一九四九以後的中國文學。特別是非中共的文學。我打算以編纂方式，並加註解來補充這方面的缺失，以便減少其他外國學生研習這個時期文學的困難。

---

13 Neal Robbins 致 John Monataro 信函，1978.08.25。原文：While living in Taiwan studying Chinese, I came to know many new authors that had never been introduced to me as an undergraduate student。以下英文書信之中文均為筆者自譯。

14 前述文章集結在顏元叔，《社會寫實文學及其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8.08）。

15 王智明，〈冷戰人文主義：顏元叔及其批評實踐〉，《中外文學》43 期 1 號（2014.03），頁 150。

首先，聶維斌表明自己的背景為在西方學習中文後來台的學生，並且同樣背景的學生也將是該文學讀本主要鎖定的讀者（target audience）。因此，這封問卷也讓我們瞭解到，當時美國華語學習、中國文學課程的素材，集中在五四運動到 1949 年之間。

接著，聶維斌將調查的範疇分為四個題目，包括：

1.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學中（大陸以外的），文學價值最高的十篇短篇小說」。
2.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學中（大陸以外的），最能代表現代中國生活及思想，能幫助西方正確了解現代中國的好短篇小說」。
3.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學中以台灣為背景且最有文學藝術價值的十篇短篇小說」。
4.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學中以台灣為背景且最能代表現代台灣生活及思想，能幫助西方正確了解現代台灣的好短篇小說」。

據聶維斌事後統計，共計收到 61 份回函，其中 56 份來得及統計，18 份全部回答，8 份結合問題或刪除問題，30 份用論說的形式或者就所有的問題統一回覆。[16] 而聶維斌在沒有電腦軟體的年代，則是先為回函信件逐一編號，統計過回函中提到的作家、文學作品後再劃記，最後以打字機以及手繪表格的方式整理結果。本文並未嘗試以現代統計方法重新驗證該數據，而是著重於分析這份資料在當時的文化脈絡中所承載的象徵意義與知識生產方式。換言之，本文將問卷結果視為一種歷史文本，重點不在量化分析的精確性，而在其所折射出的冷戰時期文學價值觀與文化政治意涵。

聶維斌所發送問卷的對象包含作家、學者、學生。其中有葉石濤、鍾肇政等知名本省作家等，也有白先勇、王文興等著名外省作家。學者與學生方面，主要來自臺灣大學、師範大學的文學系，也有少數的理工科系師生（見表一）。由此

16 Neal Robbins 致 John Montanaro 信函，1978.08.25，頁 4。

可見，他的問卷發放對象主要仍集中在台灣學術菁英階層，而非真正多元的「一般讀者」，如他後續對出版社編輯的描述：「通過抽樣調查熟稔此文學類型〔按：即小說〕的中國知識分子」，選擇出的「創作於 1940 年後的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作品。[17] 雖然聶維斌採用的「滾雪球」抽樣法（「100 位，每位至少有另一位認可」）在方法上具有社會學的正當性，但在尊重文學專業之餘，也不免有犯抽樣偏誤（sampling bias）之嫌。某種程度來說，問卷分發的對象已經決定了調查的結果。

由於調查的對象幾乎僅限於臺大、師大等校文學系的師生與海外學者，當中對現代文學、鄉土文學幾乎一面倒的偏好代表了學院派的傾向，因此，問卷的回函其實並不代表普通讀者的意見。七等生在他的回函中站在菁英主義的立場輕蔑一般讀者的意見：「與其徵得一大堆淺嘗文學的人的資料，不如去請教真正具有權威的專家的意見」[18]——而實際上，聶維斌所徵得的回覆意見的確十分能夠代表「具有權威的專家的意見」。黃春明是獲得最高票的作家，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則是最高票的作品，反映出學院派的文學審美傾向（或說限制），口味清一色地偏重當時在論戰風口浪尖上的鄉土文學。而鄉土文學陣營視為敵對的反共文學。幾乎沒有任何回函推薦當時可能更受到讀者廣泛閱讀的三毛、瓊瑤等作家的作品；即便偶有提及，也僅是承認她們「知名度高」，但並「不符合」嚴肅文學的推薦標準。[19]

除了抽樣偏誤之虞，以當今社會科學統計的眼光來看，聶維斌所設計的問卷之提問方法恐怕效度也存疑。首先是問題與問題之間的區隔並不大。即有回函表示：「坦白說，我總覺得您的問卷難以回答」。[20] 不過，比起量化研究方法上稍欠嚴謹的問題，其實問卷之所以「難以回答」，恐怕更是出於同期鄉土文學論戰中也難以取得共識的兩道難題：一、文學與社會的關係；二、如何界定「兩個中國」的困難。前者涉及創作者的文學觀，後者則關乎省籍及國族認同。比方說，問卷

17 同註 16。

18 七等生致聶維斌信函，1978.05.01。

19 例如林柏燕：「瓊瑤知名度高，符合 13，但不符 2，未列。」見林柏燕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20 陳連順致聶維斌信函，1978.04.16。

的第一與第二題，差別僅在於「文學價值最高」與「最能代表現代中國生活及思想」，換言之，若是答題者認為最能表達一時一地之生活及思想者即等同於文學價值高，則這兩道題目並無二致。例如，李元貞的回答說：「藝術價值和代表台灣是相連的」。[21] 同樣地，第二題與第四題，若是答題者將「現代中國生活及思想」與「現代台灣生活及思想」兩者視為等同（畢竟問卷開頭已經排除了中國大陸），那麼這兩道題目就也大同小異。如蔣勳的回函所說：「我覺得：你所擬的四個題目可以減縮為兩個題目；因為，1949 年以後台灣地區的中國文學，事實上，只能表現這一段時間台灣地區的中國人的生活，所以我想：第一、二兩個問題其實是與第三、四兩個問題重複的。」[22] 張漢良則表示：「二、三、四項原則上照上述，其實現代中國思想與生活背景及台灣背景與生活思背〔按：應是指思想背景〕（本人不贊成地域的劃分（provincialism）。」[23]

（二）典律與代表：文學調查的內在悖反

聶維斌在後來寫給耶魯大學出版社編輯的信件中，特別闡明了他設計問卷的深層意圖。這段說明不僅揭示了他作為一個文化中介者的思考方式，也提供了理解他如何定位台灣文學的重要線索。他寫道：

> 我們希望發現回函是否認為從台灣生發的文學是與西方及其他地方海外華僑社群有所區別的支流（separate stream）。透過第一、三題問「文學價值最高」，以及第二、四題問「最能代表」中國／台灣的生活與思想以及「能幫助西方正確了解現代中國／台灣」，我們希望能錨定除了有藝術價值的作品之外，還能更進一步貢獻於教育。[24]

這段引言表明聶維斌的問卷設計有著雙重目的：一方面探詢台灣文學的定位（是

---

21 李元貞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22 蔣勳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23 張漢良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24 Neal Robbins 致 John Montanaro 信函，1978.08.25，頁 3。

否為「有所區別的支流」），另一方面尋找兼具藝術價值與教育功能的文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聶維斌雖然提出了探討台灣文學獨特性的問題意識，卻未能（或無意）在後續的文學讀本編選與詮釋中深入發展這一視角。這可說是一個錯失的機會——他本可藉此釐清「何為現代台灣文學」的文化定位問題，但最終仍將其置於「中國文學」的大框架之下處理。此一現象與問卷回函中普遍存在的曖昧態度形成了互文關係。無論是蔣勳所稱的「台灣地區的中國文學／中國人」還是張漢良的「不贊成地域的劃分」[25]，恐怕都不符合當今本土派台灣文學史的立論基礎，不過從當時的問卷回函來看則相當普遍。歸根結底，這些問題的設定回到了「1949 問題」以及「兩個中國」的核心困境：台灣社會、思想與文學在當時的評論家眼中，究竟是作為一個與中國大陸分離的文化實體，抑或僅是代表了當代「真正中國」的社會樣貌？

除了界定「兩個中國」之難，台灣內部的多樣性與異質性也使得「代表台灣」成為一個極具爭議的命題。問卷回函針對問題當中文學代表性的質疑，不僅挑戰了聶維斌調查的前提假設，更揭示了當時台灣文學界對「典型性」的爭辯。蔣勳指出：「特別指出一篇短篇小說來反映一個社會的情況，恐怕是很困難的；譬如說，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組短篇，合起來看，才能看出它們代表了 1949 年以後台北某一階層的生活情況，單獨拆開來，比較無意義。」[26] 這一觀點直接質疑了文學典律建構中單一作品可代表整體社會的邏輯。如隱地所言：「表現『現代台灣』的作品十分難舉實例。首先什麼是『現代台灣』？『現代台灣』一方面有最現代化的都市（如忠孝東路四段，東區），有落後的部分鄉間生活。有最新潮的思想，亦有極落伍、不合時代的思想。所以無法舉出代表作品，抱歉。」[27] 隱地的回應點出了「現代台灣」的界定充滿異質性——從都會到鄉村，從前衛到保守，複雜多元的社會結構使得任何單一文學作品都難以真正「代表」台灣整體。如隱地的這一觀察實際上挑戰了文學典律建構的本質假設，暗示了在多元社會中追求「代表性作品」本身可能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企圖。這一立場不僅質疑了聶

25 同註 22；同註 23。

26 同註 22。

27 柯青華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維斌調查的前提，也間接呼應了同期鄉土文學論戰中關於城市／鄉村、菁英／大眾等母題。

在聶維斌的問卷回函中，一些文學評論者不僅對「代表性」提出質疑，更對台灣文學的歷史發展提出了尖銳的反思。這些評論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如何理解戰後台灣文學的困境與轉型，其中吳豐秋的分析特別值得關注：

>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之二十年間，台灣文壇各種園地都相當荒蕪。原因是台灣遭受日本殖民統治凡五十一年，日本勢力撤出後島上原先接受日本教育的人，在世界局勢與社會面貌劇烈轉變的形勢下，又面臨切身的語言與文字的變換，有著文學才華如吳濁流諸人，皆因上述原因而無法發揮其寫作潛力。在此期間由中國移居台灣的人們，也因生活環境與政治情勢的鉅大變遷，精神上受到極其難堪的打擊與壓力。因而使文學作品的表現顯得非常規律，劃一。這二十年間人們所接觸的文學無可避免的歸入空中樓閣式的言情、成人童話與神話的約束之中。除外，翻譯的西洋文學與日本文學也乘虛流行了許久。[28]

吳豐秋的這段評論將 1945 至 1965 年間台灣文學的「荒蕪」歸因於殖民轉型的語言斷裂與政治壓力，這一觀點體現了當時知識分子對台灣文學發展的系譜性理解。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將台灣文學「缺席」歸因於歷史創傷的敘事，某種程度上暗合了鄉土文學運動試圖「填補空白」的文化使命感。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看，吳豐秋的觀點也反映了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將文學典律的形成與政治歷史連結起來，這恰恰為聶維斌的文學調查提供了一個更複雜的詮釋框架—被調查者不僅在回應「哪些作品具代表性」的問題，也在參與定義「什麼是台灣文學」的文化政治工程。

在這個曖昧模糊的定義框架下，問卷調查結果還出現一個值得深究的特殊現象，那就是許多回函將張愛玲選入推薦作家名單。這表示，問卷上的「一九四九

28 吳豐秋致聶維斌信函，1978.04.12。

年後中國文學中（大陸以外的），文學價值最高」（問題一）或「最能代表現代中國生活及思想，能幫助西方正確了解現代中國」（問題二）的作品，雖然在聶維斌本人的設想當中極有可能是限定在台灣，但回函者對「中國文學中（大陸以外的）」這一表述之理解，卻明顯超出了台灣的地域，而擴展至包括了今日或許會被界定為華語語系（Sinophone）或離散（diaspora）的範疇。在問卷所限定的「大陸以外的」範疇中，1952 年即從中國大陸遠走香港、進而旅居美國的張愛玲，幾乎成為唯一既非台灣本土亦非戰後遷台外省作家卻雀屏中選者。

張愛玲在聶維斌的調查中受到推薦的一現象，提前觸及了後來台灣文學史中的「張愛玲難題」。在西方漢學界，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1）的出版顯著提升了張愛玲的地位，但這本英文著作對同期華文世界的張愛玲接受影響相對有限。[29] 中國一直要等到「走出革命」後的 1980 年代才重估張愛玲的文學價值。而在台灣文學史上，張愛玲則是一個奇特的「不在場的在場」，或可稱為文學史中的集體無意識。雖然她僅有在 1961 年 10 月間短暫訪台並由王禎和陪同旅遊，但卻被從葉石濤到陳芳明等一代又一代的台灣文學史家不約而同地納入台灣文學史。[30] 回函者對張愛玲的推薦，反映了一種從「屬地主義」轉向「讀者接受」的徵候。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回函附上了詳細的選擇理由，這些私下表達的文學評價反映了知識分子在非公開場域中的真實立場，具有史料價值。舉例而言，調查回函中有幾位對反共文學作家、作品表達了不以為然之意。聶維斌的問卷回函不僅提供了當時文學評價的實證資料，更揭露了公開論戰之外的批評伏流，特別是關於反共文學在台灣文學典律中的爭議地位。多位學者對反共文學作家的批評尤為引人注目。林柏燕直指：「朱西寧〔原文如此〕、司馬中原皆名家，但題材陳舊，對表現台灣社會無誠意，未列。」[31] 張漢良則從文學形式與代表性的雙重角

29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筆者感謝姚佳琪提點。

30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09），頁 153-154；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0），頁 369-373。張愛玲作品在台灣的廣泛流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宋淇夫婦在香港的推動以及皇冠出版社在台灣的出版計畫。從 1960 年代開始，張愛玲的作品逐漸成為台灣讀者，特別是知識階層的文學滋養。

31 林柏燕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度進行批判：「司馬中原、朱西寧〔原文如此〕等人小說未列入，一方面他們寫作技巧不好，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的作品，不代表一九四五年以後的現代中國。」[32] 這種評價呈現了鄉土文學陣營對反共文學的系統性質疑，即認為後者既缺乏藝術創新，也未能真實反映台灣社會。回函顯示出反共文學與鄉土文學的對立程度之深，已滲入學院派讀者的文學品味判斷。

其實，類似張漢良這樣的文學專業學者之評論已經可以衍伸討論 1945 年後「現代中國」代表權的問題，只可惜聶維斌也許受限於當下的中文語言能力，後續並沒有在研討會論文及給出版社的信件中更細緻地交代這些評議。比方說，張漢良這句話實際上包含了三個相互關聯的論述層次：首先，「寫作技巧不好」的藝術評價直接挑戰了反共文學在台灣官方文藝體系中的特權地位。其次，「不代表一九四五年以後的現代中國」則隱含了對「代表權」的爭奪。與此相對的，被林柏燕、張漢良所點名批判的朱西甯，推薦的作家文本也果真清一色為外省作家，並且其中反共文學作家不在少數。[33] 可見作家學者在推薦作家、作品時的思考的方式，都頗受到同期鄉土文學論戰的制約。至於同屬反共作家的彭歌，與朱西甯所推薦的名單頗為接近，但相較於朱西甯，彭歌對本省作家如黃春明、鍾肇政等採取較開放的態度。[34] 這種推薦模式的差異，反映了即使在同一陣營的作家之間，對台灣文學典律構成的理解也存在微妙差異。

調查展現出兩種內在悖反：一種是民主化與菁英品味之間的悖反、另一種是客觀統計數據與主觀文學評價之間的悖反。首先，聶維斌雖刻意採取「民主化」的編選流程，不以英語母語人士身分擅自根據個人喜好來決定收錄文本。如他後續致函給耶魯大學出版社編輯時所強調的：「我們留意到單一編者或者委員會可能帶有偏見，會影響對一套文學的評判。我們希望透過分送問卷給大批中國人來避免此一問題。」[35] 然而廣泛徵詢本地文學研究專業人士意見，其結果無可避免地傾向學院派菁英的品味。其次，在後續向出版社遞交的企劃書中，聶維斌主要

32 張漢良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33 朱西甯致聶維斌信函，1978.09。

34 彭歌致聶維斌信函，1978.09.23。

35 Neal Robbins 致 John Montanaro 信函，1978.08.25。

依賴問卷統計數據來強化說服力，而非深入闡述問卷回覆中學者實際申論的文學價值判斷。這種試圖用客觀數據捕捉主觀文學評價的方法學矛盾，反映了聶維斌在語言能力和對台灣文學理解深度的限制下，傾向採用看似客觀的量化資料來補強其論述。然而，文學價值的複雜性與多元性很難被簡化為純粹的數據統計。這一困境不僅是聶維斌個人面臨的挑戰，更代表了任何嘗試將文學典律形成過程系統化、數據化的方法論所必然遭遇的根本難題。

聶維斌的文學調查雖是個人自發性行為，但其蘊含的文化政治意涵遠超出個人學習興趣的範疇。在「兩個中國」的冷戰背景下，這份看似單純的學術問卷實則成為一面折射台灣知識分子文化認同與文學立場的棱鏡。問卷設計、回函內容及後續處理過程，無一不深受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的制約。一方面，問卷中「現代中國」與「台灣」關係的模糊界定，呼應了 1970 年代末中國代表權仍處於激烈爭奪的現實；另一方面，回函中對反共文學的批判、對鄉土文學的推崇，則反映了當時文學場域內部反共陣營與鄉土陣營的已滲透到作家的閱讀品味，而對張愛玲的特殊關注則或許可說是華語語系文學的先聲。從方法論角度看，這一案例揭示了文學調查作為典律建構途徑如何在表面客觀性的掩護下進行價值選擇，又如何在量化數據與質性評價之間尋求平衡。聶維斌的文學調查雖未能深入探討回函中蘊含的複雜文化政治議題，但卻無意間為我們保存了一份珍貴的歷史檔案，讓我們得以窺見冷戰時期台灣文學典律形成過程中的多重角力。

四、「中國的語調往往需要更新」

1980 年，聶維斌將在台灣蒐集到的問卷以及編書進度成果初步整理為研討會論文，以〈人民的選擇：中國大陸以外的當代中文短篇小說〉（People’s Choice: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outside Mainland China）為題，投稿到美國著名的文學研究場合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華語語言教師協會（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專場，被納入「中國文學中的隱喻」（Metaphors in Chinese Literature）小組中發表。從留存的議程來看，同場的另外三篇論文都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另外三篇分別是

關於「白居易長恨歌中的隱喻」、「中國詩中作為隱喻的『棄婦』、「李白樂府中的隱喻用典」）。[36] 儘管看起來在當時的海外漢學研究界，現代文學的討論往往仍必須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框架中進行，但其實俄亥俄州立大學的語言學教授薛鳳生（F. S. Hsueh）也已注意到了聶維斌的文學調查題旨「並不適合『中國文學中的隱喻』小組」。[37] 薛鳳生的觀察再度呼應了前以討論的台灣文學在當時學術討論中的尷尬位置。

〈人民的選擇〉在介紹文學選本編選的過程中，也展現出語言教學、文學評價、冷戰意識形態三者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仔細分析這篇論文的修辭策略，不難發現聶維斌如何在看似中立的學術論述中植入了冷戰時期特定的政治立場與文化判斷。開篇的重點並非文學，而是語言學習的實用目的：「若學生想要精通一門現代語言，他們必須接觸的不僅僅是昨日的陳舊卷冊。他們必須浸淫在典範性的當代作品中。」[38] 這段開場白看似平常，卻隱含了一種對文學現代性的即時追求——語言學習不應局限於經典文本，而應與時俱進，反映當代語言的實際使用狀態。〈人民的選擇〉一文緊接著點出華語文教學在美國面臨的特殊困境，「從語言教師的觀點來看，要平衡新舊，並非易事。有關新進作家的知識往往有限。而就本文探討的中文而言，諸如教科書等材料似乎落後了數十年。中國（Middle Kingdom）的語調（tongue）往往需要更新，因此永遠不足。」[39] 這段論述揭示了一個關鍵問題：到了 1970 年代末，美國華語教材中所呈現的中文「語調」已明顯落後於現實使用。從五四運動發展白話文起、經過 1949 年的分裂，以迄聶維斌當下所身處的 1970 年代末，期間半世紀的變化，使得早期白話文的「革命性」業已成為另一種「陳舊卷冊」。這已經不僅只是文學的問題，也可以說是自始就與白話文學的發展緊密聯繫的語言學習問題。

此處隱含了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在冷戰分裂的語境下，「中國語調的更

36 Program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at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Convention. Houston, Texas, 1980.12.27-30.

37 F. S. Hsueh 致 Neal Robbins 信函，1980.09.09。

38 Neal E. Robbins, “People’s Choi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outside Mainland Chin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ouston, Texas, 1980.12.27-30.

39 同註 38。

新」究竟應以哪一個「中國」為標準？聶維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體現在他對中國大陸文學與境外中國文學的二元對立描述中：

> 不同於被導入馬克思主義的格套（channeled into Marxist format），後又在 1966-76 年文革動亂中遭到摧殘（devastated）的大陸寫作，境外文學通常可以自由地依循個人路線（free to follow individual paths），自由吸收來自中國及其他國家傳統的養分，並以非常規的方式在語言和思想上進行實驗。[40]

這是一種典型的冷戰時期反共修辭的範例，通過一系列二元對立建構了「共產中國」與「自由中國」的對比：「被導入」（channeled into）／「自由」（free）、「馬克思主義的格套」（Marxist format）／「個人路線」（individual paths）、「遭到摧殘」（devastated）／「實驗」（experiment）。這種修辭策略不僅建立了政治上的對立，更暗示了文學與語言發展的「正統性」問題——如果中國大陸的文學「被摧殘」，那麼「真正的中國文學」傳統便只能在台灣等地區延續。這一論述完美契合了當時台灣官方的「正統中國」主張，也與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政策相呼應。

也因此，聶維斌另特別強調了「西方」因素在台灣等地區文學發展中的重要性。他以陳映真〈將軍族〉、陳若曦〈尹縣長〉、張系國〈香蕉船〉、王文興〈黑衣〉四篇作品為例（也就是後來實際收入《現代中文小說讀本》的四篇），試圖提出一套通論：

> 中國境外的短篇小說在與中國境內的創作對比時，最為顯著。中國境內的作品主要受到中國本土或蘇聯來源的影響，而在境外則是以對西方的接觸最為顯著。許多故事將偉大西方作家（尤其是現代時期）的創新手法，與東方的態度及語言可能性相結合。[41]

---

40 同註 38。

41 同註 38。

延續了前述的二元對立，在此〈人民的選擇〉更引入了「西方影響」作為評價標準——境外中國文學之所以「自由」、「創新」，關鍵在於它能夠吸收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養分。這種以西方為參照的評價框架，反映了冷戰時期美國文化政策的基本邏輯，即通過推廣西方現代主義來對抗社會主義文化影響。聶維斌進一步解釋這種「西方影響」的形成原因：「這並不單純是因為與西方有更多接觸的緣故。許多在革命後離開中國的作家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受過西方教育或傾向西方，這可能使他們難以在共產主義的中國生活。」[42] 這一論述將「西方傾向」與「反共立場」連結起來，強化了冷戰框架下的文化分野。

在聶維斌的研討會論文中，除了標準的冷戰二元論述外，他對台灣文學的跨國性特質提出了一個頗具前瞻性的觀察。他注意到當代華語文學已不再局限於單一地理疆界的現象：

> 儘管中國大陸境外的寫作大多發生在台灣，但這三十年的文學現象無疑已超越了那座小島。許多作家即使本身並未在大陸生活，通常也對那裡發生的事情抱持極大興趣，並視其為母國。這反映在他們的散文中。但這些短篇小說的視野範圍甚至超越了中國。許多作家將他們的創作背景設定在美國、歐洲，以及其他在中國動盪之後有華人定居的地方。這個時期在許多方面都很特別，因為中國意識開始以全球性的方式表現出來。[43]

這段觀察超越了單純的反共框架，指向了今日學者所稱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聶維斌敏銳地察覺到 1949 年後的台灣文學正在形成一種「全球性的中國意識」——這一文學現象既與中國文學保持著複雜的連結，又不斷向美國、歐洲等海外華人社群延伸其想像版圖。這顯示聶維斌所收集的「台灣／中國文學」認同回覆，實際上已隱含了一個更為複雜的第三維度——全球化與離散的向度。張愛玲在問卷中獲得特殊關注，或許正是這種超越地域界限的文學評價的體現。

---

42 同註 38。

43 同註 38。

五、「替我的國人向你說聲謝謝」：文學選集與民間文化外交

聶維斌的文學調查雖然初衷是為編選教材收集意見，但回函中流露的情感與態度卻遠超過單純的文學評價。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許多受訪者將這位美國研究生的學術嘗試詮釋為一種跨文化交流，甚至是一種非官方的「文學外交」。這些回應不僅反映了七〇年代末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化心態，更折射出「兩個中國」框架下台灣對美關係的焦慮與期待。

在美、中、台三角關係逐漸轉變的關鍵時刻，聶維斌的調查恰好觸及了台灣知識分子對「被代表」與「文化認同」的深層焦慮。多位受訪者對這位美國學生的研究表達了超乎尋常的讚賞與感謝，這種情感投射超出了單純學術交流的範疇，帶有明顯的「文化外交」色彩。楊昌年在回函中熱切表示：「替我的國人向你說聲謝謝，更希望你能從今後多做中、美文化交流的工作，那真是十分有意義的事。」[44] 這種將個人學術研究擴大為中美文化交流的理解方式，反映了台灣知識分子將文學視為維繫台美關係重要管道的心態。更引人深思的是，一些回應者將聶維斌的調查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例如「在紅色中國長大的，逃到美國」的馬瑞雲動情地寫道：「您是美國人，能寫出流暢的中文，且對自由中國的文化如此熱愛，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榮幸。」[45] 馬瑞雲作為一位逃離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其言論尤其彰顯了反共陣營對美國文化認可的渴求。王文興在授權作品出版的回函中特別對聶氏的編註工作予以高度肯定：「讓我再表示一次我對譯註工作的滿意。許多編書的人只求坐享其成，借用別人的作品出一出名，以致我對目前的編書潮流感到寒心。你做的工作證明〔你〕十分誠懇踏實。而且兩年前說的話你都信守不移，這點也是令我至為感佩的。」[46] 從其他作家的信件中來看，他們對於自己的作品如何進入英文世界、應該使用哪一個發行的版本，都頗為審慎。[47]

回函中最令人深思的面向，是許多台灣學者對於「外國人」關注台灣文學表

---

44 楊昌年致聶維斌信函，1978.03.24。

45 馬瑞雲致聶維斌信函，1978.04.29。

46 王文興致聶維斌信函，1979.08.14。

47 例見張愛玲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現出的特殊感激與期待。吳豐秋的回應極具代表性：「有感今日台灣大多數人仍以文學作品當作消遣工具的時候，竟然有一個外國人試圖從思想、文化、生活面貌等角度，為台灣初長的文學進行『代表性』與『普遍性』的整理工作。」[48] 這種將外國研究者視為文學品味權威的態度，一方面反映了台灣文學界對國際認可的渴望，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對本土大眾文學接受環境的某種不滿。在王鼎鈞「你所做的研究對中國有益」[49] 和叢甦「我認為您所作的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工作」[50] 等回應中，我們看到了台灣知識分子如何在美國讀者的視域中尋求文化自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回函使用「中國」而非「台灣」來指稱聶維斌研究的文化對象，這種表述反映了當時台灣知識界仍普遍存在的「文化中國」認同。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到台美斷交之間的關鍵轉折期，美國學界對中國大陸的興趣日益增長，台灣文學在「中國文學」架構中的地位面臨重新定位。回函中流露出的熱情與期待，事實上也隱含著對台美關係變化的焦慮與不安。當「自由中國」的政治定位受到挑戰時，文學譯介被賦予了（至少是在想像中）維繫台美關係的特殊使命。在這一背景下，聶維斌對台灣文學的關注或許是基於個人興趣，但卻被投射了超出個人興趣的意義。他被視為某種文化大使，足以確認台灣文學價值的西方目光，更是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中，台灣知識分子嘗試維繫美國文化連結的重要通道。這種期待雖然超出了聶維斌個人的意圖，但確實影響了他的調查成果及其後續的教材編選工作。總之，回函中對聶維斌調查的熱烈回應，超出了單純的學術交流範疇，而是冷戰背景下台灣知識分子對文化認同與國際定位焦慮的集體表達。聶維斌的文學調查因此不僅是一次教材編選的前期準備，也可供研究者窺探冷戰時期台灣的文化心理。

六、「恐怕太艱深些」：藝術價值與語言教學的兩難

聶維斌的文學調查最終於 1986 年以語言學習讀本的形式問世——由耶魯大學遠東出版社出版成《現代中文小說讀本》（*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48 吳豐秋致聶維斌信函，1978.04.12。

49 王鼎鈞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50 叢甦致聶維斌信函，1978.04.12。

副標題為「為學習中文的學生介紹、註釋的四篇短篇小說（*Four Short Stories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51] 經過與出版社三年的溝通與準備，這本旨在服務美國大學中文教學的讀本，成為台灣文學外譯史上的一個特殊案例，既有別於傳統文學翻譯，也不同於單純的語言教材。

聶維斌的讀本出版時機，恰處於台灣文學外譯的重要轉折期。若追溯台灣文學外譯史，不能不提及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於 1950 年代開始的外譯計畫。根據王梅香的研究，美新處對台灣文學史的外譯可追溯至 1950 年代 Heritage Press 的籌劃。[52] 到了 1970 年代，台灣文學外譯逐漸轉向學術主導，最具代表性的是齊邦媛於 1975 年為國立編譯館編選《中國現代文學選集：臺灣 1949-1974》（*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英譯。[53] 隨後，劉紹銘於 1976 年編輯出版《來自臺灣的中文故事：1960-1970》（*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一書。[54]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譯計畫雖然呈現台灣文學，卻仍將其置於「中國文學」的框架之內。齊邦媛把兩岸之分裂視為中國歷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必然，「中國經歷過類似的試煉和騷亂，並一再重新崛起為一統一的國家」，與當今台灣文學史立論的基礎大相徑庭。也許是為了方便西方讀者熟悉，齊邦媛在導論中的論述將台灣文學一路回溯自《詩經》以降的中國文學傳統，並視為五四以降白話新文學傳統的延續。在八年抗戰與共產革命後，「此一蓬勃發展的文學橫遭中斷。作家四散各地。

---

51 書的封面顯示聶維斌的編輯工作另有 David Kay、Rose Hsiu-Li Yuan、K. C. Wong 協助，不過幾人分別的工作為何暫且不得而知。

52 王梅香，〈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 期（2014.10），頁 223-254。

53 Pang-yuan Chi, et. al., editor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 齊邦媛推薦小說作品包括孟瑤〈向日〉、林海音〈金鯉魚的百襉裙〉、潘人木〈夜光杯〉、彭歌〈蛙人記〉、王鼎鈞〈哭屋〉、段彩華〈女人〉、白先勇〈花橋榮記〉、王文興〈黑衣〉。見齊邦媛致聶維斌信函。與其主編之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多所重疊。

54 Joseph S. M. Lau, editor,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劉紹銘書中收錄的作品包括陳若曦〈最後夜戲〉、王文興〈欠缺〉、陳映真〈第一件差事〉、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王禎和〈嫁妝一牛車〉、於梨華〈柳家莊上〉、張系國〈地〉、黃春明〈看海的日子〉、林懷民〈蟬〉、楊青矗〈冤家〉、白先勇〈冬夜〉。推薦給聶維斌的作品則是陳若曦〈尹縣長〉、陳映真〈唐倩的喜劇〉、白先勇〈遊園驚夢〉、劉大任〈落日照大旗〉、張系國〈紅孩兒〉、黃春明〈兩個油漆匠〉、王拓〈獎金 2000 元〉、奚淞〈吳李錦鳳的禮拜天〉、小野〈封殺〉、王禎和〈小林來台北〉。見劉紹銘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就在此時，在台灣的作家捨棄過去，投奔全新環境，拾起零碎的線索並開始將新的樣式編織進中國文學五顏六色的織錦中。」[55] 這種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流亡版本」的詮釋框架，在當時的國際漢學界頗為常見。

在夏志清為劉紹銘撰寫的前言中，他讚揚本土作家在作品中呈現「對鄉村、小鎮和大城市中卑微生活的熟悉」與 1930 年代中國大陸「左翼作家的黃金十年」有相似之處，但他為了沖淡台灣鄉土文學作品中可能包含的階級意涵，旋即指出劉紹銘所選的鄉土文學之異於 1930 年代中國文學之處在於「沒有任何相應的主導意識形態」。夏志清進一步表示，這些台灣作家：

> 雖然保持著他們作為中國人的完整身分，並以自己的方式對大陸懷有鄉愁，但他們對台灣和美國（因為他們可能有一天會去那裡）的現狀，比對三、四〇年代在大陸戰火硝煙中所發生的事情更感興趣。因此，以台灣為導向的區域性小說的出現，似乎是年輕人對愛國陳詞普遍幻滅的徵兆，而在三〇年代，具有區域重點的愛國主義小說是直接回應日本侵略的穩步擴張而產生的。

夏志清的文學觀點代表了冷戰時期美國對「兩個中國」的態度：隨著中國大陸「陷入中國歷史上最極權的政府統治」，台灣文學被視為一個未受共產主義污染的文學避風港，因為戰後台灣作家並未沉浸在三〇年代中國文學特有的左翼愛國熱情中。而夏志清的「美國（因為他們可能有一天會去那裡）」這句話，已經敏銳地洞察到 1960 年代台灣現代主義作家的西方影響與他們留學背景之間的關係，也與聶維斌在研討會論文中所說的「許多故事將偉大西方作家（尤其是現代時期）的創新手法，與東方的態度及語言可能性相結合」之說不謀而合。

相較於齊邦媛、劉紹銘（或說夏志清）介紹台灣小說外譯的框架，聶維斌的《現代中文小說讀本》有兩個顯著特色：首先，它不是單純的文學翻譯，而是為美國大學生學習中文服務的註釋讀本；其次，作品選擇通過了相對民主的問卷調查程序，而非僅由單一編者決定。這兩個特點使得這本讀本成為台灣文學外譯史

55 Pang-yuan Chi,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 pp. iv-v.

上的一個特殊案例。根據聶維斌與耶魯大學遠東出版社編輯 John Montanaro 的通信，《現代中文小說讀本》的原定標題為《中國之聲》（*Voices of China*），原訂收錄 12 篇作品，每篇篇首有導論、中英對照，以及補充的「大學三年級華語課程」。[56] 初步選定的名單陳映真、王文興、黃春明、白先勇、王禎和、陳若曦、楊青矗、朱西甯、張系國、七等生、張愛玲，顯見很努力地在平衡本省、外省乃至華語語系背景的作家。儘管聶維斌的編選過程使他成為台灣文學外譯的「意外的先驅」，但內容倒是不太意外的選擇。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聶維斌試圖平衡各種文學流派和政治立場，包括較具爭議性的左翼作家（如陳映真）和反共作家（如朱西甯）。最終，1986 年正式出版的版本選擇的四篇作品包括張系國的〈香蕉船〉（1976）、王文興的〈黑衣〉（1964）、陳若曦的〈尹縣長〉（1974）、陳映真的〈將軍族〉（1964）四篇。

這份文學調查帶出了幾點後續的問題，是純以編輯文學讀本角度可能會忽視的問題，唯有在語言教學現場顯現：那便是文學賞析與語言教學之間的矛盾關係。將文學作品轉化為語言教材時，必然面臨一個弔詭點的兩難，即文學經典的藝術價值與其作為語言教學工具的實用性之間的根本矛盾：最具藝術價值與典律地位的高蹈文學作品，往往因其語言技巧之複雜、文化內涵之豐富以及敘事結構之精巧而成為經典；然而，正是這些特質使得它們對語言學習者而言難以接近，甚至可能造成挫折感。在當時的問卷回函中，歐陽子是少數注意到此一問題者：「白先勇的『遊園驚夢』，我認為是中國短篇小說史上最精彩的傑作，可是如果給外國人讀，恐怕太艱深些」。[57] 文學技法高超的作品反而可能讓語言初學者打退堂鼓，也可能成為文學欣賞的阻力。這個兩難在聶維斌的問卷設計中亦未被直接考量。他的四個問題集中在「文學價值最高」與「最能代表中國／台灣生活與思想」兩大軸線上，但均未涉及作品對外國學生的可理解性或教學適用性，因此也未請回函者顧慮語言的難易度。這種忽略可能源於他作為一個對文學有熱忱的語言學習者的雙重身分——他既想接觸「真正的」文學，又面臨語言能力的限制。

---

56 Neal Robbins 致 John Montanaro 信函，1978.08.25。

57 歐陽子致聶維斌信函，1978.04。

七、結論

本研究通過分析 1970 年代美中台關係巨變之際，一名美籍學生在台灣進行的自發性文學調查——既非由官方機構如美國新聞處主導，也非文化部等台灣政府部門推動——及其後續詮釋、編選讀本的過程，揭示了冷戰時期台灣文學向外推介與華語教學的複雜互動。這一可遇不可求的個案不僅提供了鄉土文學論戰的暗面，補充了近年備受矚目的台灣文學外譯史，也試圖為理解文學典律生成的另類途徑提供方法論上的啟示。本文所探討的文學調查雖然只是冷戰時期台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小插曲，但通過這一微觀個案，我們得以窺見文學典律形成、文化外交、國族認同、外語教學等巨觀議題的交織互動。此一個案不僅形成台灣文學外譯史的「意外的先驅」，也為我們理解文學調查的方法論價值提供了新的視角。

儘管聶維斌的調查法未盡符合當今社會科學系統化的研究標準，但正是這種缺乏體制奧援、背書的隨機性與自發性（spontaneity），反而賦予了調查結果某種弔詭的正當性。由於未受官方意識形態的直接制約，這些問卷回函或許更能真實反映 1970 年代末台灣文學場域中的知識分子思潮，捕捉到那個特定時代的文學氛圍與文化心理。聶維斌的文學調查雖看似遠離政治；然而深入分析後發現，這些問卷回函無一不深深鑲嵌在冷戰政治、國共對峙、大中國主義與台灣本土意識等同期鄉土文學論戰所關注的核心議題當中。聶維斌的調查無意間提供了鄉土文學論戰的一個暗面——一個更為私密、更少受到公開輿論壓力影響的民間版本。透過這些回函，我們得以窺見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私下表達中對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複雜態度，包括對「代表性」問題的質疑、對「兩個中國」框架的回應，以及對台灣文學定位的多元思考。這些非公開場域中的文學言說，為我們理解七〇年代末台灣文學場域的內部張力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也展現了某種「民間文化外交」的實踐形態。

適宜教學的程度作為文學選本編選的重要標準，在跨文化語境中尤為關鍵。過往的文學外譯多著眼於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或其文化代表性，而較少考慮其作為語言教材的實用功能。本文考察的案例意在凸顯華文文學外譯作為華語教學材料的這一維度，值得研究者持續關注與耕耘。本文認為，語言教學與藝術成就之

間有一股結構性的張力：文學藝術成就愈高的作品，有時反而愈是不宜作為語言學習的教材。這一發現對當今台灣文學外譯計畫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冷戰時期美國的華語教學與中國文學翻譯之間的密切關聯，也為未來的研究指明了幾個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首先，1970 年代美國華語課程所使用的教材研究仍有待系統性梳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後美國高校中文課本的變化，可能反映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文化政治轉向。未來研究可嘗試蒐集、比較這一時期的中文教材，分析其選文、編排與詮釋框架的演變。其次，美國漢學家 1960-1980 年間來台學習中文的經驗，與美國高校華語教育發展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亟待開發的研究領域。這些早期赴台學習中文的美國學者，如何將其在台灣的學習經驗轉化為教學實踐？他們的文化體驗又如何影響了美國漢學界對台灣文學的接受與詮釋？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索。

最後，文學調查作為一種文學社會學方法，其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文化脈絡下的應用與變形，也值得比較研究。從美國蓋洛普民調對好萊塢電影的影響，到台灣各文學獎項的評選機制，再到當代數位時代讀者數據的收集與分析，不同形式的「讀者調查」如何參與在建構文學價值體系的過程當中？這一問題對理解文學的社會生產與接受機制具有重要意義，並引導我們思考：今後的研究者或許可以系統性地挖掘各報章文學雜誌年度進行的讀者喜好調查，如《聯合文學》、《九歌》等刊物定期進行的年度選書調查，通過這些看似日常的文學消費記錄，建構出相應於不同時代的文學接受史與閱讀社會學分析。這種「從下而上」的文學史建構方法，能夠有效補充傳統文學史「從上而下」的專家評價體系，為我們理解文學經典的形成過程提供更為多元的視角。

參考資料

一、專書

夏志清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10）。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09）。

顏元叔，《社會寫實文學及其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8.08）。

Chi, Pang-yuan., et. al. editor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1975.

Lam, Tong.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Lau, Joseph S. M., editor. *Chinese Stories from Taiwan: 1960-197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Ohmer, Susan. *George Gallup in Hollywoo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Radway, Janice. *Reading the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Robbins, Neal.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our Short Stories, Introduced and Annotated for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se, Jonatha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二、論文

（一）期刊

王梅香，〈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1952-1962）〉，《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9 期（2014.10），頁 223-254。

王智明，〈冷戰人文主義：顏元叔及其批評實踐〉，《中外文學》43 期 1 號（2014.03），頁 121-168。

江勇振，〈評 Tong Lam,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9 期（2013.03），頁 173-199。

江寶釵，〈走過的痕跡——嘉義地區文學的採集、調查、整理與研究概述〉，《漢學研

究通訊》19 卷 2 期（2000.05），頁 188-195。

陳柏旭，〈1986 年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出版緣起：聶維斌的臺灣文學調查〉，《閱．文學》79 期（2023.06），頁 74-80。

陳益源、林愛娥，〈康原作品與民間文學〉，《民間文學年刊》1 期（2007.07），頁 145-157。

（二）研討會論文

Robbins, Neal E., “People’s Choice: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outside Mainland China.”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Houston, Texas, 1980.12.27-30.

三、未出版檔案

七等生致聶維斌信函，1978.05.01。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在 1970 年代建構文學讀本：一個美國人／兩種意識形態」展覽手冊（展覽地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 1 樓大廳，展期：2023.12.25-2024.09.15）。

王文興致聶維斌信函，1979.08.14。

王鼎鈞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朱西甯致聶維斌信函，1978.09。

吳豐秋致聶維斌信函，1978.04.12。

李元貞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林柏燕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柯青華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馬瑞雲致聶維斌信函，1978.04.29。

張愛玲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張漢良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陳連順致聶維斌信函，1978.04.16。

彭歌致聶維斌信函，1978.09.23。

楊昌年致聶維斌信函，1978.03.24。

齊邦媛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劉紹銘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歐陽子致聶維斌信函，1978.04。

蔣勳致聶維斌信函，日期不詳。

叢甦致聶維斌信函，1978.04.12。

F. S. Hsueh 致 Neal Robbins 信函，1980.09.09。

Neal Robbins 致 John Montanaro 信函，1978.08.25。

表一　聶維斌自行整理之表格

說明：若有錯誤字詞、資訊及語句不通順之處，仍依原件謄打。唯出生年分因涉及個人隱私，不譽錄於此。稿件上另有顯然為母語人士之筆跡以其他顏色墨水協助補充資訊，在下表中以底線方式註記。

	生在哪裡／住在哪裡	男／女	大學	主要的職業？	也做過的職業？	等等
1駱學良	福建生／台灣	男	未受大學教育（青年軍）	民生報編輯	前聯合報副刊編輯	筆名馬各
2陳芊斐	台灣／台灣	女	台大外文三年級	學生		
3游淑禎	／台灣	女	台大外文四年級	學生		
4李元貞						
5林柏〇	／台灣	男		教授St. Huggins Technical School		
6王裕仁	台灣／台灣	男	台大中文系畢業	服役	作家（詩）	出版過詩集
7林學禮				明道文藝？		
8劉紹銘	生於香港／Wisconsin USA	男	台大外文學士，U of Indiana comp lit 1966	Assoc. Prof of Chinese at U of Wisc (1972)	作家，翻者，has taught at U of HK and U of Singapore	Joseph S. M. Lau
9石玲媛	台灣／台灣	女	台灣大學外文四年級	學生		
10朱西寧	山東臨朐人／台灣	男		現從事專業寫作（小說）	主編新文學雜誌，new anthology or anthologies	原名朱青海
11歐陽子	日本廣島／台灣 austin, Texas, USA	女	台大外文系 U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	作家（小說），批評家	「中國現代小說選集」的編者	原名洪智慧 Beatrice Yen「現代文學」的基本作家之一 翻譯「第二性」
12潘秀玲	台灣／台灣	女	台大外文四年級			
13阮秀莉	台灣／台灣	女	台大外文三年級	學生	作家（小說）	

	生在哪裡／住在哪裡	男／女	大學	主要的職業？	也做過的職業？	等等
14吳念真	台灣台北縣／台灣	男	輔仁大學夜間部會計系三年級	小說作家		本名吳文欽
15吳慧君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美國各大學語文聯合研習所（史丹福大學）？？			
16吳魯芹	／Arlington, ViA, USA	男	武漢大學外文系畢業		編New Chinese Writing（1962）	Lucian Wu
17蔡源煌	台灣／台灣	男	台大外文碩士	台大〇教〇授講師（外文系）	批評家，「中外文學」的編輯	
18王文興	福建福州人／台灣	男	台大外文系畢業U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 Phd	台大副教授，（中文）和（外文系）	作家，批評家	「現代文學」雜誌創辦者
19王鼎鈞	山東臨沂人／台灣	男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作家（散文小說，劇本，評論）	筆名方以直
20吳豐秋	／Toronto, Canada	男	畢業於大同工學院電機系	Chief Engineer and Manager of Electrical Dept. Northern Elevator, TORONTO	作家	Francis C. Wu
21白先勇	廣西桂林／Santa Barbara Calif.	男	台大外文系學士，U of Iowa碩士	副教授U of Calif Santa Barbara	作家，「現代文學」的發行人	Kenneth Pai
22葉石濤	台灣／台灣	男			批評家，作家	
23金戴熹	／Paris, France			INALCO Department of Chine Université Paris III		Chin Day-hsi
24楊昌年	／台灣	男		師　教授「近代小說」課	寫了「近代小說研究」（a history of the modern short story）	
25蔡秀女			師大國文系三年	學生		

	生在哪裡／住在哪裡	男／女	大學	主要的職業？	也做過的職業？	等等
26鍾肇政	台灣桃園人／台灣	男	台灣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任台灣文藝雜誌主編	作家（小說，電視劇）	
27痖弦	河南人／台灣	男		聯合報副刊編輯	作家（詩）	原名王慶麟
28蔡文甫	江蘇人／台灣	男	廈門大學政治系畢業	中華日報副刊編輯	作家 教師、軍人	
29彭歌	河北人天津市出生／（1949）台灣	男	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碩士）1963 U of Illinois Phd in Journalism	中央日報編輯	作家，教授，翻者	原名姚朋
30鄧美卿	台灣／台灣		師大校會教育學系四年級	學生		
31丁琪	台灣／台灣	女	Washington UniversityDept Chi and Jap研究生	學生	Teacher at Stanford Center 1972-1975	
32林劍虹	台灣／台灣	女	台大外文系四年級	學生		
33陳映真	台灣／台灣	男	淡江文理學院外文系畢業		作家（小說）	原名陳永善
34陳添枝	台灣台北縣／台灣	男	台大電機系畢業	電器業〇學〇生	高雄水泥廠工程師	
35陳若曦	台灣（台北）／Vancouver, Canada	女	台大畢業，1971在美國留學（Johns Hopkins）（Phd）	作家（小說）		Mrs. Lucy Tuan「現代文學」創辦者（1966-1973住大陸）原名陳秀美
36齊益壽	福建／台灣	男	台大中文碩士	台大副教授（小說課）		
37顏元叔	湖南人／台灣	男	台大外文系畢業	台大教授（外文系）	批評家，作家	

	生在哪裡／住在哪裡	男／女	大學	主要的職業？	也做過的職業？	等等
38叢甦	山東／New York	女	台大外文學士，U of Washington (Seattle) Phd Columbia U Phd	Head of the Rockefeller Memorial Library	作家	Y. T. Weissman
39黃慶萱						
40段彩華	江蘇省宿遷縣人／（1949）台灣	男	沒讀過大學，軍人	「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職務	作家	
41張曉風	江蘇徐州人／台灣	女	東吳大學中文系	陽明一學院國文副教授 東吳中文系教授	作家（散文小說）	
42廖珮如	台灣／台灣	女	台大中文系畢業	高中老師（中文）	作家	
43黃毓秀	台灣苗栗／台灣彰化	女	台大外文研究所二年級		與曾珍珍合譯「希臘悲劇」	
44林海音	台灣苗栗／台灣 生於日本	女	北平世界新聞專科學校	主持純文學出版社	北平世界日報記者，編輯台灣國語日報編輯等，作家（小說，散文）	
45蔣勳	／台灣	男	文化學院歷史系一藝術研究所	雄師美術月刊主編		寫了「齊白石」、「徐悲鴻」
46張漢良	山東人／台灣		台大外文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五年級	台大外文系教授講師		
47張健	浙江人／台灣	男	台大中文碩士	台大中文系教授		
48張良澤	台灣省彰化縣人／台灣	男	台南師範學校畢業，成功大學中文系，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院，文學碩士	成功大學中文系講師	批評家	

	生在哪裡／住在哪裡	男／女	大學	主要的職業？	也做過的職業？	等等
49周樹華	山東人／台灣	女	台大外文系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班三年級	台大外文系講師		
50柯青華	浙江永嘉縣人／台灣	男	政工幹校新聞系畢業	現任爾雅出版社主編	「書評書目」編輯作家，批評家	筆名隱地
51陳正芬	／台灣	女	台大外文三年級	學生		
52柯慶明	／台灣	男	台大中文碩士	台大中文系教授講師	批評家	
53樂蘅軍	安徽人／台灣	女	師大國文系畢業台大中文碩士	台大中文系（小說課）老師副教授	研究文學理論、神話、古典及現代小說的學者	做了「古典小說散論」「宋代話本研究」
54姚一葦	福建人／台灣	男	廈門大學畢業	批評家 中國文化學院戲劇學研究所主任	劇作家、戲劇理論家	教育部中國話劇欣賞演出委員會主委
55姚垚	台灣／台灣	男	台大中文系畢業，台大中研一	研究學生		彭歌的兒子
56夏祖麗	北平／台灣	女	實踐家專會計科畢業	出版者（純文學叢書）	1在婦女雜誌工作過 2寫了很多訪問記，由「純文學出版社」印成三冊	何凡、林海音的女兒
（作者按：以下來不及列入問卷調查統計）						
57詹宏志	台灣／台灣	男	台大經濟系畢業	聯合報		
58馬瑞雪	／Phila, Pennsylvania USA	女	〔無法辨識〕		作家（小說、詩、散文）	1967以前與家人住在大陸 Cecilia Chi
59於黎華	浙江鎮美人（生於上海）	女	台大歷史畢業 UCLA Phd	New York State U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of.	作家（小說）曾以「揚子江幾多愁」獲米高梅創作首獎	Mrs. Helen Sun
60賴瑞和	廣東人／台灣	男	台大外文二年級	學生		

	生在哪裡／住在哪裡	男／女	大學	主要的職業？	也做過的職業？	等等
61張者雪	／台灣		台大外文二年級	學生		外文系學生名單查無此人